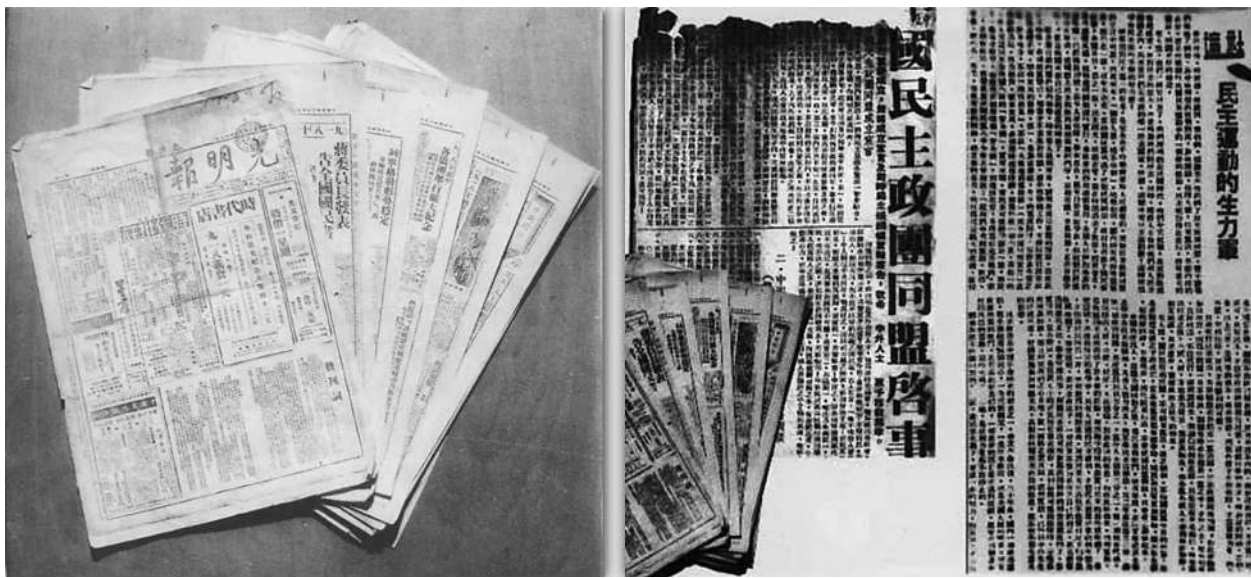


画好最大“同心圆” 答好时代“新答卷”

张福成



1941年9月18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出版了机关报《光明报》，10月10日发表“启事”，宣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并公布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

亲密合作 协商建国

5月17日，在全国政协“委员读书漫谈群”开设的“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专栏中，全国政协委员张福成围绕“讲好中华儿女大团结的故事”主题，重温了多党合作的光辉历程，回顾了中国民主同盟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团结合作共事81载的难忘岁月，本刊作以摘编。

民盟诞生于中华民族危亡的重要关头，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共产党结成了“血肉相连、情同手足”的关系。民盟于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上清寺“特园”（民主人士鲜特生私邸）秘密成立，当时的名称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其时，由于“皖南事变”的发生，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合作遭到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危机四伏。国共两党以外一些主张抗日的政党和人士，迫切希望联合起来，为坚持团结民主抗日而斗争。于是，以部分国民参政员于1939年11月成立的“统一建国同志会”为基础，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公推黄炎培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1941年9月18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报《光明报》在香港正式出版，10月10日，《光明报》发表“启事”，宣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已在重庆成立，并公布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简称“十大纲领”）。

1941年11月17日，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大会召开。会议期间，民主政团同盟参政员张澜等人根据民主政团同盟的纲领，向国民参政会提出了《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并得到了董必武、邓颖超等20多位参政员的联署。从此，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就由秘密变为公开，以中间党派身份出现在国民党统治区。

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全国代表会议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会议决定，民盟组织的名称由“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为“中国民主同盟”。会议拟定了《中国民主同盟纲领（草案）》，把建立联合政府、建设民

主国家作为民盟的奋斗目标。这个纲领，是民盟第一个初具规模的正式纲领，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社会等6个方面制定了46条具体主张，表达了民盟对政治建设的基本设计，体现了民盟的阶段性使命。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民盟与中国国民党亲密合作，坚持抗战，争取民主，反对内战，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英勇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民盟与中国国民党亲密合作，坚持抗战，争取民主，反对内战，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英勇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民盟与中国国民党亲密合作，坚持抗战，争取民主，反对内战，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英勇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6年1月，民盟参加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国国民党团结合作，同国民党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力促达成有利于和平、民主的“政协决议”。之后，国民党违背“政协决议”，进而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强制解散。

1948年1月，民盟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成立临时总部，公开宣布同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为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同年5月，民盟与各民主党派一起，通电响应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口号”。

1949年1月，民盟公开宣告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9月，民盟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筹建工作，民盟的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100多年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运动取得了历

史性的伟大胜利，标志着爱国统一战线和全国人民大团结在组织上完全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

同舟共济 勠力同心

新中国成立后，民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参与国是决策和国家事务管理，为恢复国民经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巩固人民政权和经济建设、巩固和发展改革开放成果等发挥了积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国多党合作的基本格局由此确立。

1956年2月，民盟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的口号。为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民盟积极发挥作用，就知识分子问题和文化教育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有远见的意见和建议。

这一时期，民盟同中国共产党共同前进，共同经受考验，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民盟的政治纲领，通过发表各种宣言、号召、决定和指示，积极拥护和参与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等群众性运动，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一代代盟员，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热切渴望，自觉转化成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强大动力，积极投身国家建设事业，参加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切实履行起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挚友和诤友的政治责任。

继往开来 共赴使命

1979年10月，民盟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决定把民盟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来。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把1982年1月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提出的“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融为一体，作为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十六字方针”是“八字方针”的丰富和发展，是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必须遵循的方针。

1983年至2012年，民盟先后举行了第五至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加强参政党自身建设，做了不懈的努力。在这期间，民盟中央提出了为经济建设“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办实事”的号召。通过实践走出了一条开发民盟智力资源，参与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制订与实施的新路子，尤其是在参与教育改革和智力扶贫方面，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

民盟以爱国的情怀、踏实的作风、扎实的知识，团结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法制建设服务，为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服务，为实现祖国统一服务，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服务。

在新时期，民盟秉承“奔走国是，关注民生”的优良传统，围绕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积极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持恒精准开展社会服务，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献计出力，为多党合作事业的不断发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新的贡献。

（作者系第十二、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夜》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是由他译为英文的，译本在长时间内被作为中国翻译界汉译英的样本介绍到海外，他因此享誉海内外学术界。然而，他的英文主要靠极大量阅读和认真钻研学来。他的例子说明，英文尤其是学术英文、有水平的书面英文，不可只依靠到英语国家去生活得来。

作为许老先生教过的最后一批弟子，作为英语教学和翻译界的后人，我想到，老一代翻译家如傅雷、林语堂等，不仅为中国介绍进来一批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而且引入了西方的思维方式与文化，甚至对现代汉语的句式与文风都产生了不可逆的巨大影响。从另一个角度说，绝大多数中国人眼中的外国，是译介者所介绍给他们的外国；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译介者介绍过去的中国，可见我们翻译工作者所起的作用之大。

1994年8月，许孟雄教授以91岁高龄逝世。8月9日，我从他简朴的遗体告别仪式归来，心情难以平静。许老先生自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开始执教以来，已历时65年。几十年岁月，他教过的学生确是桃李满天下，他们的年龄跨度一定也是巨大的，而能来向导师道别的学生却不可能太多。这也许是教师职业的特点之一吧，一生育人，育出的人越出色，走得越远，海外天边，难以寻迹。

陈羽纶教授写给许孟雄教授的挽联，代表了无数人对老先生的追思：“华夏一奇人秉性刚直铮铮铁骨，授业解惑探源索隐巨笔如椽。”

作为文人的陈独秀

刘朝侠

文人轶事
WENREN YISHI

陈独秀不仅是对中国现代史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人物，还擅长书法、精通画理、谙熟文学，对此知之者未必很多。

陈独秀是近代书画家陈庶之子，陈独秀受父亲影响，自幼谙熟字画。他行草法古姿逸，行楷操入隶书笔意另有一番趣味。陈独秀还擅长写小篆，有时用小篆写信。台湾人文学界重镇、一代书法宗师台静农逝世后，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及台先生门人，先整理编辑了《台静农先生辑存遗稿》出版，又整理编辑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拟编为两册，因以陈独秀的书信最多，共102封，足以单独成书，就加入陈独秀赠台静农诗文、书法等，于1996年出版《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一）》。陈独秀这些书信，是台静农1946年赴台湾大学任教时带去的，一直珍藏着，只给少数知己看过，不为世人所知，其中几封信就是用小篆写的。

陈独秀不仅擅书，对书法还有很高的见识，他给台静农的信中有一段谈书法的文字：“尹默字素来功力甚深，非眼

面朋友所可及，然其字外无字，视三十年前无大异也。存世二字王字，献之数千近真，羲之字多为米南官临本，神韵犹在欧褚所临兰亭之下，即刻意学之，字品终在唐贤以下也……”

陈独秀对画也有独到的见解。他家中藏画颇丰，见识甚广，尤其是王石谷的画看得很多。据他在《美术革命》一文说：“我家所藏和见过的王画，不下二百多件。”（《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但他不欣赏王石谷的画，因为王石谷重临摹，缺乏创新。所以他在《美术革命》一文中批评说：“若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的命。”今天看来，这种认识未必正确。但陈独秀这篇文章对当时的美术界影响很大。

陈独秀作为一代精神领袖不但有思想、善诗文、通书画，在学术研究上也成就颇丰，他著有《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拼音文字草案》《连语类编》《小学识字课本》等。1932年10月，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在金陵狱中他还撰写《宋末亡国史》及《明末亡国史》，以为今人之鉴。

蒋兆和画人物

王剑

文人轶事
WENREN YISHI

中国现代水墨人物画的一代宗师蒋兆和，原是一个商业画家。受徐悲鸿的影响，逐步成长为关注人生、关注社会的著名艺术家。他在传统中国画的基础上融合西画造型之长，建构出一种全新的笔墨技法，使中国水墨人物画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新中国成立后，蒋兆和的画风实现了从晾制“苦茶”到酿造“美酒”的转换。1952年，蒋兆和被周总理点名，为李时珍和祖冲之两位古代科学家画像。他找遍国内典籍，也没有找到二人的画像资料，心中不免犯愁。有一天，他阅读《本草纲目序言》时，看到了“予窥其人，哗然貌也，隤然身也”的字样，心有触动；这不正是自己的岳父“京城名医”萧龙友的模样吗？于是，他以萧龙友为原型，画了李时珍；又以气象学家竺可桢为蓝本，画了祖冲之。这两幅画像递交上去后，受到了周总理的肯定和表扬。

后来，蒋兆和以自己为原型，画了杜甫。画面上，杜甫骨格瘦削、傲然孤寂，整幅画透露出浓郁的悲愤与苍凉。他觉得，真正的杜甫就该是这个样子；他又以身边人为蓝本，画出了屈原、庄子、司马迁、曹操、张仲景、张衡、陶渊明、孙思邈、僧一行、李白、苏东坡、李清照、文天祥、郭守敬、曹雪芹等历史文化名人的画像，有些画像还被编入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和中小学课本。

谈到作画初衷，蒋兆和说：“我画历史人物，主要看他当时与国家、与民族、与人民的关系。这有利于激发现代的青年、教育青年一代，要有民族自豪感、民族自尊心和正义感，使青年一代对中国历史、文化要有所知。”

金庸捐款

王厚明

文人轶事
WENREN YISHI

1979年前后，金庸以《明报》记者的身份造访台湾。期间他主动拜访台湾著名作家、评论家李敖，然而李敖却不待见金庸，认为武侠小说在文学里不入流，是不上台面的。

闲谈时分，金庸说到，自1976年10月19岁的长子查传侠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自杀离世后，这些年开始精研佛学，已经是虔诚佛教徒了。李敖当即质疑道：“佛经里讲‘七注财’‘七圣财’‘七德财’，虽然有点出入，但大体上都以舍弃财产为要件。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亿万家财一文不舍呢？”金庸闻言一时语塞，李敖则称之为“金庸式伪善”。

面对李敖的责难，金庸并没有计较，几十年来，他将数十亿版权费全部捐给了慈善，其中仅为香港中文大学便捐赠了1000万港币、为家乡浙江嘉兴一中捐赠了300万港币，并无偿将斥资1400万元兴建的云松书舍捐赠给杭州政府。但金庸对自身却十分“吝啬”，一天三餐俭朴无华，一碗米饭、一盘青菜或一小盘鱼或肉。用餐时，若不小心餐桌上

掉了一粒米、或一片菜，他都要用筷子夹起来吃掉。

金庸为了研学佛学而买下了全套英文版的《原始佛教》书籍，并学习梵文，自己解读梵文版的佛经。他对朋友说：“自从我研习佛经后，我就看淡了生死，对于那些名利得失自然也无所谓了。”20世纪90年代，金庸向北京大学捐赠了100万元，这项资金也作为当时北京大学国学研究的启动资金。2001年前后，张纪中联系金庸谈《笑傲江湖》的改编费用，这本是一宗呼金喊银的“大买卖”，但金庸一天后就回复：“愿以一块钱的价格将小说版权转让给央视，想拍哪部作品都可以。”

2007年，金庸已经封笔多年，也没有收入，就在那样的情况下，他一次性就向北京大学捐赠了上千万元，这笔钱就被用来设立了“金庸国学基金”，全方位资助北大国学研究院的教学、研究、翻译、出版等活动，而且在捐款时金庸反复叮嘱要保密、不要声张。当被记者问及捐款的理由时，他说：“没有任何理由，该捐就捐。”

金事鲁迅

郑学富

文人轶事
WENREN YISHI

1912年2月，鲁迅经推荐，进入蔡元培任总长的教育部工作。同年8月，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任命他为教育部金事。《鲁迅日记》载，1912年8月“22日展览教育部任命名氏，余为金事”。

“金事”是何种级别的官职呢？鲁迅在一篇杂文《从胡须说到牙齿》中提到：“我曾经是教育部的金事，因为‘区区’，所以还不入鞠躬或顿首之列的；但届春秋二祭，仍不免要被派去做执事。”在北洋政府时期，政府各部最高首长为总长，副职为次长，以下设参事、司长、金事、科长、主事、科员。当时不设处级，司下面便是科，而“金事”是司长的助手，相当于副司长或司长助理。

鲁迅这个“金事”之取月薪工资是多少呢？《鲁迅日记》1912年8月30日记载：“下午收本月俸百二十五元，半俸也。”此后每月到手的月俸是240元，即五等官俸。之后，鲁迅职务虽然没有升迁，但是俸禄却涨了两次：到1914

春蚕到死丝方尽

——怀念许孟雄教授

郭晓惠

我有幸受教于许孟雄先生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一群中国人民大学1978年复校后才来任教的青年教师，基本上是大学本科毕业，急需继续深造。所以我们一边教着年龄大小不一、从农村、工厂、建设兵团返城或者直接来自高中的学生，一边跟着几个外教和许孟雄教授进修。

许孟雄任教于我们外语系的师资班和青年教师进修班，主要讲授英文语法和汉英翻译。我记得他在语法课上讲解他研究英语语法尤其是介词、冠词的独特成果。他的教法独辟蹊径，自成体系；他的学识渊博，旁征博引。他的课不仅使我们水平提高，还吸引了来自其他院系的慕名者，甚至包括五六十岁的外系教授。教室里常常座无虚席，没座位者就站着听讲。许孟雄操一口福建口音相当重的普通话，讲课时精力充沛，一站就是两个小时，尽管那时他已年近八旬。

许孟雄对英文的独到理解，和严谨的治学态度，都使我们受益匪浅。他深厚的文化素养给予我们潜移默化的

影响，他的为人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是他毫无专家学者架子，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学生向他请教时，哪怕水平不高，问题幼稚，他一律耐心回答，认真讲解，不厌其烦。当时我系有好几位青年教师，一到备课就去他家请教，占用他很多时间。二是他秉性倔强执着，刚正不阿，说话直言不讳，难免得罪世俗与权贵，以至于一生坎坷，多年遭受不公正待遇，吃了许多苦。

许孟雄1903年出生在福州的一个书香世家。18岁就开始译介中国文章到海外，据说斯诺先生来华前就曾受到他的译作的影响。以他的智慧、勤奋和执着，本可以成就一番更大的事业，留给后人更多的文化财富，可惜盛年时未能正常从事教学和翻译工作达20多年之久（1957年从北外来人大后不久就被错划为“右派”，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平反）。

后来，许孟雄手头有了许许多多稿件，如审订《简明英汉词典》，主编巨型工具书《韦氏三版英语大词典》，写作《英语难题研究一千家》等等，又撰

写了多篇学术论文在国内外发表，他便不再给我们上课，在校园里也很少见到他的身影。找他的人太多，他就在住所门口贴上“请访客谈话不要超过十分钟”之类的纸条，那就是他在工作了。他一生勤奋，工作至死，直到近90岁高龄，还每天凌晨起身，在打字机、字典前整日工作。倘有急稿，凌晨3点就爬起来伏案。

1992年秋，我即将赴英国牛津大学进修之前，在人大校园中见到白发白衣的许老先生正在散步，他独自一人，清瘦的身形直直地前行，目不环视，仿佛仍在专注地思考自己头脑中的问题。我近前向他问候，为多年前有一次在课上讲课外教材使他不快而道歉，他肯定已经忘记了那件事，甚至记不清我了，但他瘦削的脸上立即露出笑容，眼光敏捷有神，显然因与过去的学生意外相逢而喜从心生，立刻就有了亲切的沟通。其时，他已是89岁的老人了，这就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

许孟雄先生是我国的著名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为数不多的真正精通英语的学者之一。茅盾的名著《子